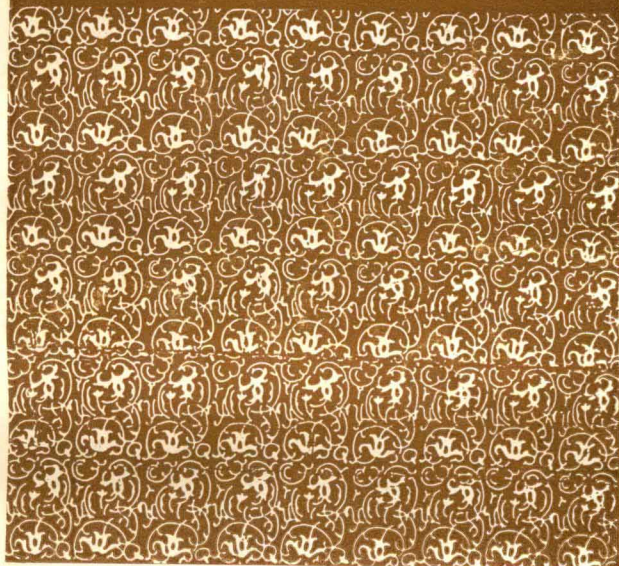


中国史学 近代化进程

蒋 俊 著



齐 鲁 书 社

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

蒋 俊 著

齐 鲁 书 社

鲁新登字07号

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

蒋 俊 著

齐 鲁 书 社 出 版 发 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125 印张 2 插页 269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33—0405—5

K·86 定价：14.00 元

山东省华夏文化促进会文史哲工程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新史学”的形成及发展	14
第一节 “新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14
第二节 梁启超与“新史学”	19
第三节 “新史学”的发展及其特点	35
第二章 “实验主义史学”的兴起	48
第一节 “实验主义史学”形成的原因	48
第二节 “实验主义史学”的理论渊源	53
第三节 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思想	62
第四节 “实验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	71
第三章 “古史辨”学说及其影响	77
第一节 顾颉刚与“古史辨”	77
第二节 “古史辨”的理论与方法	86
第三节 史学界对“古史辨”的评论	97
第四章 “史料建设派”的思想与方法（上）	108
第一节 “史料建设派”的形成	108
第二节 王国维的学术思想与“二重证据法”	115
第三节 傅斯年论史学就是史料学	124
第五章 “史料建设派”的思想与方法（下）	137
第四节 陈寅恪以考据为主的治史途径	137

第五节	陈垣对传统治学方法的总结与发展	152
第六章	“历史研究法派”的史学思想	168
第一节	梁启超后期思想变化和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168
第二节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总结	172
第三节	梁启超论史料	179
第四节	梁启超后期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	186
第五节	何炳松的史学思想	197
第七章	几个理论问题的讨论	208
第一节	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史学思想的发展概况	208
第二节	关于历史学性质问题的讨论	213
第三节	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的讨论	226
第四节	关于历史学价值问题的讨论	243
第八章	史观述评（上）	250
第一节	民生史观及其流派	250
第二节	生机主义史观与“文化的生物学观”	272
第三节	社会有机体论	282
第九章	史观述评（下）	300
第四节	文化形态史观	300
第五节	其他史观	320
第十章	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史学发展的动向	334
第一节	史学研究的多元发展	334
第二节	史学与抗战	349
第三节	史学与国内的政治斗争	360
后 记		383

绪 论

本书旨在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资产阶级史学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的功绩与局限。不少同志对“资产阶级史学”一词的科学性提出质疑，笔者目前还未找到更准确的概念代替它，只好沿用旧说。下面，就本书的理论与方法作几点说明。

一、史学思想史的基本内容

“史学思想”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的内涵，大体相当于广义的“史学理论”。由于当前理论界对史学理论的结构体系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有所谓狭义史学理论与广义史学理论的区别，为免误解，本书才使用了“史学思想”一词。

史学思想属于历史学的理论层次，这是相对于史料搜集整理、史实分析综合、史书编撰等实践层次而言的。毫无疑问，史学思想是史学实践的总结与升华，反过来又接受史学实践的检验并对史学实践起指导作用。但历史学又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思想上层建筑往往受制于政治上层建筑，因此，一个时代的政治制度、政治斗争、政治思潮，便对史学思想有着重要影响。史学思想的发展也离不开哲学，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与解释，研究方法的运用，都与当时的哲学发展水平有关。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一个时代的史学思想，是那个时代的史学与政治、哲学的交会点，政治

和哲学通过史学思想影响史学的发展，而史学思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思想的面貌和特点。因此，为了认识一个时代的史学思想，一定要认真研究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潮和哲学思潮。

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会对史学思想产生影响，但除了可以直接借用的技术方法之外，一般说，自然科学对史学的影响，常须通过哲学的中介，即首先将自然科学的某些理论上升为哲学理论，然后再通过哲学影响史学。至少在我们研究的这个历史时期是这样。史学思想当然也不能脱离传统，但传统只有与现实需要相结合才更能显示力量，在现实面前，传统也只能屈尊降心并不断改变自己去适应它。史学思想的发展，常因新观念、新方法的引进而受到推动，乃至改变其方向。但新观念、新方法的引进，必须与内部条件相合，即不但要与社会潮流相一致，而且还要接受史学实践的检验和认可。被嫁接过来的理论，一定要得到它所依托的史学砧木的营养，否则，很快就会变成枯枝。

由此可见，史学思想史的内容，一方面要描绘出其自身发展的曲线，另一方面，也要对这一发展曲线的形成，给予全面的、科学的解释和说明。

史学思想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价值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史学价值论是关于历史学自身价值，亦即其功用的理论，其核心问题是“求真”与“致用”的关系。作为一门科学（或力求客观地反映过去的学问），史学要求求真，而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史学又必须能够致用，即为一定的社会集团服务，这“求真”与“致用”的对立统一，构成了史学价值论的基本内容。

中国的传统史学，常是“求真”服从“致用”，在“致用”的大前提下“求真”，即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史学为“资治”“训戒”的工具的前提下考证史实，并以此达到二者的统一。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史学，则更多地表现为两者的分离，即一个时期“求真”占主导地位，另一个时期又逐渐向“致用”倾斜；一部分史家标榜“求真”，而另一些史家却强调“致用”。史学价值理论对史学实践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一般说，当“致用”潮流居主导地位时，史研究会过分着眼于社会功用，易流于片面、空疏和浮泛；而当“求真”潮流居主导地位时，史学研究又多注意于史料的鉴别和史实的考证，而出现烦琐、枝蔓的弊病。为了纠正这些弊病，史学价值理论常被迫进行自我调整，于是便形成了“求真”和“致用”两种倾向交替上升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不过也说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史学价值理论还远没有达到圆熟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求真”与“致用”的关系，实际就是史学的科学性与党性的关系，两者的真正统一，只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成，但研究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无疑会对这一过程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本体论是指历史的本源或对历史研究对象的想法，即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历史是怎样发展的，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历史本体论的核心是历史观，它集中反映了史学与政治和哲学的关系，是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划分不同史学流派的重要根据。

历史认识论是讨论历史认识的可能性以及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正确认识已经逝去的历史实际、检验历史认识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的理论。尽管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思想中的认识论部分

并不发达，但毕竟还是提出了一些对后人具有启发作用的论点，而且在当代史学理论中，历史认识论的地位愈来愈显赫，所以，我们也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史学方法论可分为三个部分，即搜集、鉴别和考订史料的方法，对史实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的研究方法，史书的编纂方法。史学方法与史家的世界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相对地说，在史学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它是受政治因素影响最小的。正因如此，史学方法也就带有更大的普遍性和共通性，从而引起了各派史家的共同重视。而史学方法的改进，又直接推动了史学研究的进步，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看得非常清楚。

史学思想的各部分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史学思想史的任务，不仅要说明史学思想的形成与政治、哲学、传统的关系，更要具体描绘史学思想各组成部分的发展、相互关系及其对史学实践的影响。

二、关于中国近代的史学革命

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内容丰富，头绪纷繁，必须有一条基本线索将其贯串起来。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史又是整个中国近代史学思想史的一部分，所以它的发展线索应与中国近代史学思想史相一致，这条线索便是中国近代的史学革命。

中国近代史学革命理论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是中国近代史的范围，中国人民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是进行民主革命，从根本上

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以便把中国推向近代化的道路。与这一革命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要进行哲学革命、伦理革命、文学革命、史学革命。史学革命是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任务和进程都受民主革命的制约，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和相对的独立性。中国近代史学革命的目标是批判、改造旧史学，初步建立科学的新史学，包括科学的史学思想体系和科学的中国史体系。

中国的民主革命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即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史学革命也经历了两个时期，即资产阶级的史学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革命。资产阶级史学革命承担的历史任务是破坏和批判旧史学，引进新的观念和方法，为科学的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准备思想资料，同时，对旧史料进行整理考释，不断扩充新史料，为科学的中国史体系的建立打下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史家则在批判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扩大和发展史学革命的成果，初步建立科学的史学思想体系和科学的中国史体系。

我们可以对中国史学革命的进程作这样的划分：十九世纪末是史学革命的准备时期；二十世纪初到二十年代末，是以资产阶级史家为主进行史学革命的时期；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家为主进行史学革命的时期。建国以来，史学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努力推进中国史学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的时期。

史学革命不仅是贯串中国近代史学和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也是对不同史学派别进行历史评价的主要标准。判断一个派别、一种思潮、一部著作的价值高低，主要应看它是否有利于史学革命。凡有利于史学革命的进行，为史学革命做了扫

清障碍和添砖加瓦的工作的，都应给不同程度的肯定，并当作史学遗产接受下来。在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上，过去有人提出过各种标准，如以是否赞成唯物史观来划线，政治态度标准、政治身分标准，甚至有人使用双重乃至多重标准。这都是违背历史主义和科学精神的。以史学革命作为近代史学评价的主要标准，并不是降低唯物史观的地位，恰恰相反，只有这样做，才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真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和评论。如果不顾历史条件，硬以唯物史观划线，结果就会把许多有贡献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划到线外去了，那么，中国近代的史学革命就变得残缺不全，而最终违背了唯物史观。当然，史学革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任务，评价的具体标准也不完全相同。例如，在二十世纪初年，是否赞成进化史观，是史学思想评价的具体标准之一，而到四十年代，史学革命已发展到第二阶段，是赞成还是反对唯物史观，也就成了史学思想评价的具体标准之一。但这些具体标准是与史学革命这个总的标准相一致的，我们讲以史学革命为标准，也就包含了各个阶段的具体标准，所以没有必要在史学革命之外另立一个标准。事实上，史学思想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绝不像学生考试一样，只划“+”、“-”号就可解决。例如，四十年代的资产阶级史学家，有相当一部分虽然不赞成唯物史观，却在微观研究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这就要根据其成就与不足，分别进行细致的研究，竭力避免简单化的倾向。

由此可见，研究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史，必须掌握中国近代史学革命的理论，并以此为统率，为武器，弄清各种思潮、

流派、人物在史学革命中的作用、地位，并尽可能地作出客观的评价。

三、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发展阶段

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新史学阶段、实验主义史学阶段和多元发展阶段。

从二十世纪初到五四运动，是“新史学”阶段，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形成时期，以梁启超为主要代表人物。新史学阶段是中国民族大觉醒、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史学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批判旧的史学思想体系，用新观念改造旧史学。具体地说，就是以历史进化论取代历史复古论或历史循环论，用推动民族自觉的史学价值观取代资治、垂训的史学价值观，用民族进化史取代少数帝王圣贤的历史，用新的历史分期取代王朝体系。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十分强调“致用”，不仅以史学为救亡、变革服务，而且也为党派的政纲辩护，在这种情况下，“求真”的功能便被相对削弱。遭到政治轻薄的史学，要重新取得独立的地位，必须修正其价值观念，改变发展方向。

从五四运动开始，到二十年代获得重大发展的实验主义史学，正是适应了这一客观要求而出现的。实验主义史学虽由胡适首先提出，却并不完全受他的局限，实在代表了二十年代资产阶级史学的主流。其特点是标榜求真，提倡治史从科学的方法入手，而不重视史观的作用，用功的重点在史料的鉴别、考释、扩充，史实的考证，而不汲汲于宏篇巨制。它既是对“五四”以前新史学弊端的补救，也是史学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即从引进新观念到引进新方法，从对旧史学的理论批判到史料批

判与扩充，从对旧史学的大刀阔斧的破坏，转向新史学的踏实的基础建设。这一时期，史界明星聚集，硕果累累，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鼎盛时期。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虽在国内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但由于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集中力量进行国民革命，无产阶级史学仍处于萌芽状态，还无力承担领导中国史学革命的重任，所以，直到二十年代末，这副担子仍然放在资产阶级史学的肩上。

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的阶级矛盾和中华民族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矛盾相互交织，日益尖锐。在这种复杂的形势面前，专注于史料建设和微观研究的资产阶级史学已无力继续承担领导史学革命的重任，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则异军突起，在社会史大论战中表现了蓬勃的战斗精神，使前此的一切史学流派都相形见绌，于是，领导史学革命的担子，便由她责无旁贷地挑了起来。此后，资产阶级史学在史学革命中的地位，便由主角降为配角。它一方面仍然为科学的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提供某些素材，为科学的中国史体系的建立提供史料，另一方面，又不赞成或公开反对以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阻碍史学革命的继续发展，表现了明显的二重作用。这是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第三阶段的基本特点。

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即一方面，史料派仍有着较大的势力，另一方面，史观派也已形成；一方面，“求真”派仍在固守阵地，另一方面，“致用”派再次崛起；一方面，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为许多人所遵循，另一方面，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流派也日渐活跃。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政治分野也日益明显，维护当局的在朝派，抨击当局的民主派，以及形形色色治国方案的提出者，

常以史学为工具，表达其政治见解。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这些特点，是与资产阶级在国内的政治地位相适应的。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经过对社会史论战的反思之后，认识逐渐统一，步调渐趋一致，他们同心协力，初步完成了中国近代史学革命的任务。

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史学 思想的意义与方法

研究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

首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承担了史学革命冲刺阶段的任务，而且还承担着科学地总结史学革命进程的任务。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是中国近代史学革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讲史学革命而不讲资产阶级史学，就像讲中国革命而不讲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样，破坏了历史的完整性。史学思想是史学的主脑，它影响着史学的发展，史学革命首先是史学思想领域的革命。所以，讲中国的史学革命，一定要讲资产阶级史学，一定要讲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

其次，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要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一定要认真研究资产阶级史学思想。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是对中国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与资产阶级史学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相互影响，两者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的面貌。例如，某些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家曾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提出许多责难，为

了回答这些责难，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便对这些问题做了重点的研究与发挥，相反，在其他方面，如历史认识论问题，就显得用力不够。这只有认真研究当时史学界的复杂情势，才能得到正确解答。

再次，研究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有助于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丰富与发展当代的史学理论。目前，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正处于一个自我开拓和自我发展的新阶段，这不仅要吸收当代一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而且也要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是西方史学思想与传统史学思想撞击和融会的过程。吸收有价值的外来观念、方法，批判地继承传统史学的有益成分，并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而形成新的体系，这是一切有成就的史学家的成功之路。而那些只知墨守成规，不思进取，或不顾中国史学的特点与水平，盲目引进不适用的外来理论的人，所创造的常是失败的记录。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于理清和明确当代史学理论发展的思路，是十分必要的。

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史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理论资料。由于我国的史学理论界在建国后长期与西方处于隔绝的状态，所以一旦开放，所谓“新理论”、“新观念”不断涌进，一时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近十多年被人们当作新理论介绍的某些观念与方法，早在四十年代甚至更早就有人提出并且讨论过了。当然，不同的时代，讨论的深度不同，但是，如果我们熟悉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就可以首先从整理和总结历史上的讨论情况入手，这样，至少可以提高今天讨论的起点，少走一些冤枉路。

此外，加强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理

由，就是繁荣学术。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我们过去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非常不够，致使大片的学术园地，至今仍处于抛荒状态。举几个例子：建国前出版了数十种《史学概论》及类似的理论著作，但至今还很少有人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为了与唯物史观相对抗，资产阶级学者提出了十几种唯心史观，其中包括一度被当作官方哲学、先后出版了数十本书、发表了数百篇文章进行宣传的“民生史观”，但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对这些史观进行分析和评论的论著。不了解这些与唯物史观相对垒的理论，又怎能科学地说明唯物史观在斗争中的发展呢？又如，我们对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思想研究，目前仍在围着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少数几个人转圈，而对于写了数十万字的理论著作并自成流派的常乃德、朱谦之、雷海宗、钱穆等人的研究，却很少有人问津。上述情况表明，加强对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填补某些空白，繁荣这块学术园地，是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史学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任务。

然而，要想短时期内在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史研究领域取得显著成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这一领域涉及到古今中外史学理论的交叉问题，需要研究者具有较高的素质和各方面的知识基础，而具备这些条件的人并不多。其次，资料多而零乱，获得不易。属于这个课题的资料，可谓浩如烟海，又都分散在报纸、期刊和著作中，存于全国各地，搜集极其不易。有些论著，本来发行量就少，历经损坏，更难寻觅。近十多年，社会上思想愈来愈开放，资料却愈来愈受到禁锢，学者搜讨，难于西天取经。正因如此，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举步维艰，进展缓慢。

不过，对于有志攀登的人来说，常是困难愈大，吸引力愈